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王学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 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 暗于大理”, 礼制建设停滞, 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 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 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 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 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 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 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 以凸显皇权存在, 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 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 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 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 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 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 寓仁义风谕之旨, 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 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 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 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 强调“从容中道, 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关键词: 王褒;《洞箫赋》;汉宣帝;礼乐

中图分类号: I2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2-0163-07

《文选》卷十七“音乐”类首载王褒《洞箫赋》, 为“音乐赋之祖”。《洞箫赋》文辞优美, 善于描摹物态, 穷变于声貌, 相关艺术成就研究成果丰富^①。“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1](675)}, 由昭、宣时期礼乐兴衰变化背景来看, 笔者认为《洞箫赋》重在阐发儒家雅乐思想, 赋作本身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创作目的在于为宣帝兴雅乐之举张本。

一、汉昭帝时期礼乐之衰及对文学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武功显赫, 礼乐隆盛, 在儒家学者看来文教礼乐治民比武功更为重要, 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详述武帝兴建礼乐之举却不言武功, 认为“汉承百王之弊, 高祖拨乱反正, 文、景务在养民, 至于稽古礼文之事, 犹多阙焉。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 举其俊茂, 与之立功。兴太学, 修郊祀, 改正朔, 定历数, 协音律, 作诗乐, 建封禅, 礼百神, 绍周后, 号令文章, 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 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 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 虽《诗》、《书》所称, 何有加焉!”^{[2](212)}司马光《资治通鉴》直斥:“孝武穷奢

极欲, 繁刑重敛, 内侈宫室, 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 巡游无度, 使百姓疲敝, 起为盗贼, 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也肯定武帝“尊先王之道”之举, “然秦以之亡, 汉以之兴者, 孝武能尊先王之道, 知所统守, 受忠直之言, 恶人欺蔽, 好贤不倦, 诛赏严明, 晚而改过, 顾托得人, 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3](747-748)}“先王之道”指礼乐教化之道, 出自《论语·学而》, 云:“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刑昺认为:“此章言礼乐为用相须乃美。……言先王治民之道, 以此礼贵和美, 礼节民心, 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 礼至则不争, 揖让而治天下者, 礼乐之谓也, 是先王之美道也。”^{[4](10)}

汉昭帝时期未能延续武帝礼乐隆盛的局面, 礼乐衰微。《汉书·礼乐志》未提及汉昭帝时期礼乐活动, 《汉书·郊祀志》载:“昭帝即位, 富于春秋, 未尝亲巡祭。”^{[2](1248)}《汉书·昭帝纪》也很少涉及礼乐活动, 现有记载主要涉及宗庙祭祀(后元二年二月“戊辰, 太子即皇帝位, 谒高庙”、始元元年“夏六月, 皇后见高庙”)、藉田之礼(始元元年春二月“己亥, 上耕于钩盾弄田”、“六年春正月, 上耕于上林”)、大雩礼(“夏, 旱, 大雩, 不得举火”)、飨宴之礼(元凤“二年夏四

收稿日期: 2012-11-06; 修回日期: 2012-12-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2年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项目“先唐礼制与文学发微”

作者简介: 王学军(1986-), 男, 安徽芜湖人,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典文学。

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和昭帝冠礼(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其余礼仪则“无有所兴”。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局面的形成与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汉昭帝为武帝少子,即位时只有八岁,在位期间一直未亲政,作为“受其长者支配而登基的未成年的皇帝”,汉昭帝“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积极作用”。^{[5](193)}这一时期主要由霍光执政,“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2](217)}、“政事壹决于光”^{[2](2932)}、“光秉政前后二十年”^{[2](2948)},霍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2](2936)}、“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2](2967)}儒家认为制礼作乐需贤明的王者或圣人,《礼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6](1091)}“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6](1093-1094)}《汉书·礼乐志》亦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2](1027-1029)}汉昭帝时期霍光的地位虽然类似辅佐周成公的周公,“处伊尹、周公之位”^{[3](752)}、“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奭、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2](233)}但霍光本人“不学亡术,暗于大理”^{[2](2967)},既不能如周公般制礼作乐,也难以维系汉武帝时期礼乐隆盛局面。此外霍光秉政时期承汉武帝民生凋敝之后,与民休息为“时务之要”,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昭帝君臣所重,“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2](233)}。

汉代礼乐兴变与文学盛衰联系紧密,两者常呈现正相关的一致性。礼乐之兴常能提供新的文学题材,形成新的社会热点,有推动文学创作之功,如汉大赋与汉武帝时期礼乐同步兴起。赋家职官上多属礼官系

统,导致汉赋细致描写天子礼,这标志着汉代大一统礼制的建立与完成,同时这一时期崇儒重礼及尚文观念也影响赋作尊帝都、崇王道思想以及繁缛风格的形成^②。汉武帝兴礼乐促成诗赋之盛,“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2](1043-1045)}与之相对,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这一时期少有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③,以致今人费振刚所编《全汉赋》竟无一篇昭帝时期的汉赋作品^[7]。现存诗歌数量极少,文学成就也不高,如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刘弗陵《黄鹄歌》、刘旦《歌》、《华容夫人歌》等作品^{[8](107-108)}。与之前汉武帝及之后汉宣帝时期的文学成就相比,汉昭帝时期文学中衰,诗赋创作进入低谷,三朝文学发展略呈“U”字形。

二、汉宣帝时期礼乐之盛及其深层原因

与昭帝时期礼乐衰微的局面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例如《汉书·郊祀志》详述汉宣帝时期频繁的天神、地祇、人鬼祭祀活动云:“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飨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禱而三祠云。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柱、石鼓于临胸,之罘山于睡,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

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明年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凤。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东，祠后土，赦天下。后间岁，改元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虚铜人皆生长，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后间岁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单于于甘泉宫。后间岁，改元为黄龙。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单于于甘泉宫。”^{[2](1248-1253)}又如《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载汉宣帝兴乐府事云：“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童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2](2821-2822)}

昭、宣两朝礼乐兴衰之变并非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也不仅是帝王个人喜好，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条件紧密联系，下面主要谈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明正统，确立宣帝即位的合法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9](133-134)}汉宣帝为卫太子之孙、汉武帝曾孙，在昭帝早崩无子、昌邑王旋立旋废的特殊背景下即位^④。巫蛊之祸中，卫太子起兵被杀，汉宣帝也受之牵连下狱侥幸未死，之后卫太子一直被定位为“罪人”，如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有一男子乘黄犍车，建黄旆，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当时京兆尹隼不疑叱从吏收缚送诏狱，认为“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2](3037)}因此就卫太子血统角度而言，作为罪人之孙，汉宣帝即位的合法性自然面临挑战。宣帝即位的前三年（前77），右将军张安世不同意其兄张贺将女儿嫁给宣帝，认为“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子女事”。^{[2](3964)}甚至连身份低微的鬲夫许广汉的妻子都不愿将女儿嫁给汉宣帝。这就不难理解汉宣帝即位时，武帝之子广陵厉王刘胥大为不满，认为“太子孙何以反得立？”。^{[2](3964)}宣帝也意识到卫太子“罪人”身份在皇位合法性方面的不利影响，即位后不久即试图为之平反，“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但并未取得宣帝

预料结果，卫太子依旧被加以恶谥“戾”^{[2](274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戾”云：“了戾，乖戾，很戾皆其义也。引伸之训为罪。”谥号中，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可见以“戾”为卫太子谥号，实际上并未改变其罪人身份。

由于卫太子有此“原罪”，宣帝即位的血统“合法性”不得不追溯至曾祖武帝，因而宣帝为卫太子平反未成功后，转而兴礼乐以尊武帝正统，确立皇位的合法性，“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2](1248)}本始二年宣帝诏书云：“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尊武帝正统很快达到预期效果，“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2](243)}

其次是强化皇权，重新建立皇帝权威。宣帝即位之初，霍光依旧专权如昭帝之时，直至地节二年（前69）去世，前后秉政二十年之久。“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邻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2](2948)}当时人对此也有认识，如任宣认为：“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视丞相亡如也。”^{[2](2953)}霍光去世前，宣帝依旧未亲政，只能在有限的“宗庙之祀”范围内兴礼乐以尊武帝正统，确立皇位的合法性，带有弱势的防御性质，“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2](1248)}鉴于霍光的权势和废立昌邑王的前例，宣帝即位之初忌惮霍光之极，同乘有芒刺在背之感，“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2](2958)}

霍光去世后，霍氏残余力量很快被清除，旁落二十年的政权重新回归到皇帝手中。强化皇权，重新建立皇帝权威成为当务之急，兴建礼乐则是手段之一，带有强势的进取性质。族灭霍氏的次年（前65），“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

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2](2749)}这实际上否定了八年前霍光专权时期所下的“《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的结论^{[2](2748)}。卫太子之子、宣帝生父史皇孙“祭以天子”、“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这进一步确定了宣帝皇位的合法性。此后不久宣帝下诏云：“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飭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2](1248)}从此宣帝身体力行，“修武帝故事”，努力彰显皇权存在，大兴乐府，恢复了天神、地祇、人鬼祭祀活动，包括甘泉太一之祀、河东后土之祀、五岳、四渎之礼等，尤以京师附近最为密集，“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2](1250)}汉宣帝还常因祥瑞之事而祀，如“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2](1249)}，甚至因听闻“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宣帝即不远千里遣王褒前去祭祀，“宣帝使褒往祀焉”。^{[2](2830)}

第三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武帝时崇儒兴学，儒学成为禄利之途，“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2](3620)}此后儒士通过仕进遍布朝廷，“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2](3596)}儒家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当时邹鲁之地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2](3107)}宣帝即位前长于民间，亦熏染儒家文化，“受《诗》于东海漉中翁，高材好学”^{[2](237)}；“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2](238)}宣帝在位其间也重视儒学，曾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称制临决”以断，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其自作诏书也常引《诗》、《书》为据。礼乐之兴为儒家文化中太平之世的标志，“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6](1091)}、“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2](1029)}。儒家文化成为宣帝时期兴礼乐的主要思想渊源，当时儒士多参与礼乐建设之中，遂成一代之胜。

第四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礼乐之兴耗资不菲，汉武帝因文、景两代数十年积累方能内兴礼乐、

外攘四夷，及武帝末，百姓流离，蓄积消耗殆尽，社会危机严重。征和四年（前 89）武帝下诏书云：“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此后霍光秉政二十年间也以休养生息为要，“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宣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2](2821)}这为礼乐之兴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要指出的是，宣帝治国策略是“霸王道杂之”^{[2](277)}，认为不能纯用儒家德政统治臣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2](277)}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这种实用性目的使礼乐很大程度上成为工具化的行政手段。宣帝时期兴建的礼乐实际上并不全面，主要局限于象征性和政治性较强的祭祀与乐府两个方面。这就注定宣帝无意于“纯任德教，用周政”以恢复宗周礼乐治国之策^{[2](277)}，因而儒臣王吉批评：“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2](1033)}王吉引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之言，提议全面制礼以为国用，“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对王吉的建议，崇尚“霸王道杂之”的宣帝不以为然，“上以其言为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3](844)}

三、礼乐建设背景下的《洞箫赋》解读

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雅乐是其中重要一环，“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中央有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渤海赵定、梁国龚德两人的作品列入《汉书·艺文志》“乐”类，“《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2](1711)}宣帝时任谏议大夫和待诏的刘向所作《别录》云：“赵氏者勃海人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雅琴龙氏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见待诏，后拜为侍郎。”上好下效，地方

官员也有心于兴雅乐，当时益州刺史王襄请王褒作颂扬汉德的《中和》、《乐职》、《宣布》诸诗，挑选何武等人依雅乐《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之后何武等就学长安，歌于太学，为宣帝所知，征王褒待诏，之后王褒作有《洞箫赋》等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最早提及《洞箫赋》，其名为《洞箫颂》，“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2829)}《说文解字》释“颂”云：“兗也。从页公声。”段玉裁云：“颂仪也。……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则知假容为颂其来已久。以颂字专系之六诗。而颂之本义废矣。汉书曰徐生善为颂，曰颂礼甚严，其本义也。”^{[10](416)}据此“颂”本义为兗，指颂仪，后以容受释颂，美盛德之形容。洞箫为乐器，本身难当“颂”义，唯有发掘其礼乐之器具的内涵，方能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文心雕龙·颂赞》认为颂之正体源于《诗经》“三颂”，以褒德显容为要，“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1](157)}汉代颂体文学创作常受大赋铺陈笔法影响，例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刘勰认为这些作品有失颂体，“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可能正是由于这些作品“雅而似赋”^{[1](157)}，不同于颂之正体，因而《文选》改《洞箫颂》为《洞箫赋》，但并未改变其褒德显容的内涵。

汉宣帝意识到王褒作品中的“颂”义，《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面对臣下辞赋歌颂“淫靡不急”的责难时，宣帝先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2](2829)}，这一点多为后世研究者所重。然而单纯的大小区分难以赋予辞赋歌颂中“小者”创作的充分正当性，宣帝区分辞赋大小之后，重点强调辞赋“小者”创作之合理性，认为“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2829)}这种辞赋“小者”创作的正当性建立并非于“大者”之外别起一家，弃仁义风谕之旨不顾，而是在“辩丽可喜”的形式内融入仁义风谕，两者在内蕴上依旧相通，这与汉人认为郑、卫之诗不失诗三百“思无邪”之义相似。因此“辩丽可喜”只是辞赋“小者”的形式特征，并非其核心内容。如果辞赋“小者”仅有“辩丽可喜”的形式和“虞说耳目”的功能，则与倡优博弈相近，宣帝所谓“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一

语则无从着落，仁义风谕之旨正是辞赋“小者”创作的正当性所在，也是其贤于倡优博弈之处。有研究者认为“在这场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11](195)}这显然与宣帝之言的原义不合，辞赋“小者”在“辩丽可喜”的形式之外依旧需要有仁义风谕之旨，并非纯以娱乐为旨归。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675)}，与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相关，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是宣帝所肯定的寓仁义风谕之旨于“辩丽可喜”形式之中的辞赋“小者”代表。洞箫为乐器，本身难当“颂”义，王褒发掘其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礼记·乐记》集中论述了儒家音乐思想，年代与《洞箫赋》相近^⑤。《洞箫赋》全文按照内容可分为竹材、制箫、发声、声之类、声之感、乱辞六个部分，这里试比对《礼记·乐记》并结合相关材料重释其儒家雅乐内涵^⑥。

(一) 竹材之德化。竹为制箫之材，《礼记·乐记》认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洞箫赋》也以竹材比德，认为制箫之竹具有“洞条畅而罕节”的特点，“条畅”本为条直通畅之义，《礼记·乐记》云：“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故“条畅”一词也隐括“长远舒畅之善气”“平和之善德”之意。王褒以大段文字详述竹材的生长环境，竹成箫材的关键在于顺天势而厚根底，“托身軀于后土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这也与《礼记·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相合。经历长期磨炼，竹形成清静淡泊之德，“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唯此方可为制箫之材，这实际上也是将竹“天性之自然”特点进行道德化阐释。《礼记·乐记》认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与之相似，王褒也认为竹之最终定名为洞箫还需王者推动，“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

(二) 制箫以合礼。《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洞箫赋》也强调箫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夔妃准法”，种种装饰“带以象牙，搃其会合。搜缕里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都需要

符合礼制规定而不逾矩,“胶致理比,挹拊擗”,如此方可“德盛而教尊”。

(三) 瞽朦奏乐。《洞箫赋》以盲人乐师为洞箫主要吹奏者,“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闇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这继承了先秦时代瞽朦奏乐的传统,如《国语·周语》载:“瞽献曲,史献书,师篇,瞽赋,朦诵。”^{[12](11)}《周礼·春官》载:“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13](440)}郑玄云:“凡乐之歌,必使瞽朦为焉。”^{[13](440)}朱熹云:“古者乐师,皆以瞽者为之,以其善听而有审于音也。”^{[14](187)}西汉时乐工主体并非瞽朦,《汉书·礼乐志》言汉哀帝时“钟工、磬工、箫工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2](1073)}由此可见汉代宫廷箫工仅有一人。《洞箫赋》之所以恢复先秦时代瞽朦奏乐的传统,强调瞽朦吹奏发声,实际上是对当时汉宣帝兴雅乐的积极响应。

(四) 箫音的道德属性。根据高低强弱的不同,《洞箫赋》将箫音分为赋予道德属性的巨音、妙声、武声、仁声等类,巨音“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妙声“清静厌瘵,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武声“澎湃慷慨,一何壮士”;而仁声“优柔温润,又似君子”。《礼记·乐记》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箫音因演奏者感物而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演奏者由于感物而动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特质的乐声,遂有巨音、妙声、武声、仁声之别,这也与《礼记·乐记》所言相通,“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五) 箫乐的教化效果。《礼记·乐记》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音乐有重要的教化作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与此相同,《洞箫赋》认为箫乐有具有“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的教化作用,“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怵。刚毅强暴反仁恩兮,啍啍逸

豫戒其失”,能使残暴不仁之徒反省醒悟,“瞽、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悴”,因而王褒强调“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这实际上是鼓吹雅乐的教化之效,呼应宣帝兴雅乐之风。

(六) 乱辞。《礼记·乐记》认为古代雅乐为“德音”。“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洞箫赋》乱辞部分也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为宣帝兴雅乐之举张本。

四、结语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注释:

① 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丹博《附声测貌 冷然可观——论王褒〈洞箫赋〉的艺术成就》(《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许志刚、杨允《〈洞箫赋〉与〈长笛赋〉文艺思想研究》(《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等。

- ② 关于汉赋与汉礼具体联系, 参见许结《汉赋与礼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 ③ 参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部分(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747-1755页)。
- ④ 当时武帝子孙在世者尚有广陵王刘胥、燕王刘旦诸子孙, 霍光出于巩固权力的考虑, 隔代而立昭帝孙辈的宣帝, 《汉书·霍光传》载: “广陵王已前不用, 及燕刺王反诛, 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
- ⑤ 《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选集, 一般认为作者不止一人, 写作时间也有先后, 大致为战国秦汉间儒者所作, 今存《礼记》为《小戴礼记》, 为西汉戴圣选编, 编成书约在宣帝时期, 《汉书·艺文志》云: “汉兴, 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 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乐记》成书年代与《洞箫赋》创作年代接近, 两者可相互参证。
- ⑥ 以下《礼记·乐记》文字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73-1150页);《洞箫赋》文字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783-790页), 不另注。
- 学出版社, 1958.
- [2] [汉]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4] [魏]何晏疏, [宋]邢昺疏. 论语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5] [英]崔瑞德, 鲁惟一. 剑桥中国秦汉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6]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费振刚. 全汉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8]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0] [汉]许慎著,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1] 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12] 徐元浩. 国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3]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4] [宋]朱熹.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参考文献:

[1] [南朝·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

Wang Bao *Dongxiaofu* and ritual system construction during Han Xuan Emperor reign

WANG Xue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ule of emperor Han Zhao, Liyue declined, because Huo Guang was ignorant and incompetent, and the stagnant ritual system ruined. Poetry and Fu declined together with Liyue. Unlike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ao, Han Emperor committed to Hing Lile, Lile of the Shengyuan Sheng Zhao Di period. The Han Xuan Dixing Lile realpolitik need for consolidating political power, consciously Seized with the line policy. Washback to highlight the imperial power exists, reconstruction sidelined two decades emperor authority. To promote silence for a long Cifu Creation XuanDi the carved out the the Cifu size of the other, certainly in the form “Debates welcome into righteousness wind encyclical for the endowed.” Od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Xuan Dixing Lile, Wang Bao Xiao Fu” was originally named “Xiao Chung, trying to discover the meaning of dongxiao Lile appliances, Katy, United Sidley describe righteousness linked the blending, encyclical the purpose of righteousness wind, conferred for itself is also the Gagaku activities in Xuan Dixing integral part. Xiao Fu” focus on the elucidation of the Confucian Gagaku connotation connected with the “Book of Music” musical thinking, stressed Dehua and bamboo made flute to aggregate ceremony with blind deceiving music Xiaoyin moral attributes, flute music enlightenment effect chaos resigned as part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nfucian emphasis on “comfortably middle way, the music is not prostitution Xi” the Confucian of the Gagaku Deyin qualitative and beauty.

Key Words: Wang Bao; *Dongxiaofu*; Han Xuan Emperor; Liyue

[编辑: 胡兴华]